

皇山徐乾學年譜稿上編

王逸明 編著

新編清人年譜三種重訂稿

王逸明

編

陈祖武先生序

一九九七年初，逸明先生枉驾寒舍论学，宾主谈艺，尝及清人年谱纂辑事。睽违三载，忽接逸明兄大著《新编清人年谱稿三种》清样，捧物如晤，喜不自胜。拜读一过，始知近三年间，逸明先生之足迹不惟遍布京中各大图书馆，而且远涉江南，读书访古，请益时贤。其为学之辛勤，其追求之执着，令人感佩，为之肃然。

《新编清人年谱稿三种》，谱主依次为徐乾学并其二弟秉义、元文，庄存与及其侄述祖，黄式三以周父子。诸家或为名臣，或为名儒，皆关系一时社会与学术甚大。惟或因头绪纷繁，梳理非易；或缘文献阙略，摭拾为艰，故而在现存众多清人年谱中，三家则付阙如。有鉴于此，逸明先生以诸家著述为主要依据，博采官私史籍、档案文书、方志谱牒、文编杂说，兼及时贤论著，详加比勘，别择断制，寒暑迭经而克成斯编。全书元元本本，可据可依，洵为知人论世之力作。近数年间，祖武以读乾嘉学术文献为功课，于常州庄氏学术之渊源，每有所思。喜逸明之大著先得我心，仅赘数语，敢唱同调。

在迄今的乾嘉学术研究中，对常州庄氏学术的研究，尚是一个薄弱环节。清中叶常州庄氏之学肇始于庄存与，中经其侄述祖传衍，至存与外孙刘逢禄、宋翔凤而始显。晚近学者论常州庄氏学术渊源，往往着眼于社会危机或权臣和珅之乱政，从学理上去进行深入探讨，则尚不多见。其

实，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论究的问题。所谓社会危机或和珅乱政云云，如果用过去观察庄述祖以降之常州今文学，抑或恰当，而据以解释庄存与之《春秋》公羊学，则恐怕难以联系得上。

关于这个问题，为清代学术史研究奠基的诸位大师，从历史环境和学风递嬗着眼，皆有过讨论。章太炎先生早年著《馧书》，率先留意此一问题，指出：

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途自然也。文士既已熙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诗》齐、《尚书》伏生，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诗》、马、郑《尚书》。然皆以公羊为宗。始武进庄存与，与戴震同时，独喜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辞》，犹称说《周官》。其徒阳湖刘逢禄，始专主董生、李育，为《公羊释例》，属辞比事，类别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然其辞意温厚，能使览者说绎。及长州宋翔凤，最善附会，牵引饰说，或采翼奉诸家，而杂以讖纬神秘之辞。翔凤尝语人曰，《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藏》也。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章炳麟《馧书》第十三《清儒》）

继太炎先生后，梁任公先生自今文经学营垒中出，于此一学派的兴起别作解释云：

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们的文学

是阳湖派古文，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开派。两派合一，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四《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

对于章、梁二位先生所论，钱宾四先生并不甚满意。所以钱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只是吸收二家论究之合理部分，转而别辟蹊径，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

钱宾四先生探讨常州庄学之渊源，注意力集中于苏州惠氏学术的巨大影响上。苏州惠氏一门，从康熙间惠有声发轫，经惠周惕、惠士奇莫立藩篱，至乾隆初惠栋崛起，四世传经，自成一派。关于苏州惠氏学风，钱宾四先生归纳为「推尊汉儒，尚家法而信古训」。（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戴东原》）正是从对苏州惠氏学风及其影响的准确把握入手，钱宾四先生旁征博引，创立新说，提出了「常州之学原本惠氏」的主张。钱先生的结论是：「常州公羊学与苏州惠氏学，实以家法之观念一脉相承。」（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一章《龚定庵》）

章、梁、钱三位先生之所论，尤其是钱宾四先生的解释，从宏观学风的把握上，为我们研究常州庄氏学的渊源，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至于深入进行具体研究，解决诸如庄存与何以要撰写《春秋正辞》一类的问题，则是三位先生留给后学的功课。以下，以接武钱宾四先生的思路，就此试做一些努力。

同惠栋相比，庄存与是晚辈。存与生于康熙五十八年，较惠栋年少二十二岁。乾隆九年，惠栋撰《易汉学》成，率先揭出复彰汉学之大旗。翌年，庄存与始以一甲二名成进士，时年二十七

岁。惠栋《易汉学自序》云：

六经定于孔子，毁于秦，传于汉。汉学之亡久矣，独《诗》、《礼》、《公羊》犹存毛、郑、何三家。《春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氏所乱，《易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校同于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而未尽亡也。惟王辅嗣以假象说《易》，根本黄老，而汉经师之义，荡然无复有存者矣。（惠栋《松崖文钞》卷一《易汉学自序》）

常州毗邻苏州，惠栋表彰汉儒、兴复汉学的倡导，庄存与随父宦游南北，当能知其梗概。

乾隆十四年，清高宗诏举潜心经学之士。惠栋为两江总督黄廷桂、陕甘总督尹继善保举，列名荐牒。十六年，因试期在即，惠栋深以不能如期入京为忧，于是致书尹继善。书中有云：

栋少承家学，九经注疏，粗涉大要。自先曾王父朴庵公，以古义训子弟，至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诗》、《礼》、《毛》、《郑》、《公羊》何休，传注具存。《尚书》、《左传》，伪孔氏全采马、王，杜元凯根本贾、服。唯《周易》一经，汉学全非。十五年前，曾取资州李氏《易解》，反复研求，恍然悟洁净精微之旨，子游《礼运》、子思《中庸》，纯是《易》理。乃知师法家传，渊源有自。此则栋独知之契，用敢献之左右者也。（惠栋《松崖文钞》卷一《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

此时庄存与正在翰林院为庶吉士，置身儒林清要，职系四方观瞻，于惠栋之表彰汉儒经说，

当有更深体悟。乾隆二十三年春，庄存与以直隶学政条奏科场事宜，「奏请取士经旨，悉遵先儒传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八，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丙申条）或可视为对惠栋主张的响应。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言，表彰汉儒经说者，《易》有惠栋，《礼》有江永及徽州诸儒，《诗》则有戴震，惟《春秋》公羊说尚无人董理。庄存与因之起以自任，亦是情理中事。

庄存与之发愿结撰《春秋正辞》，一方面固然是惠栋诸儒兴复汉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此时的清廷好尚和存与自身地位分不开。

高宗初政，秉其父祖遗训，以「首重经学」为家法。乾隆十年四月，高宗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昭示天下士子：「将欲为良臣，舍穷经无他术。」（《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九，乾隆十年四月戊辰条）庄存与即是经此次殿试而进入翰林院庶吉士馆。乾隆十三年五月，庶吉士散馆，存与考列汉书二等之末，本当重罚，高宗念其「平时尚留心经学」，（《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五，乾隆十三年五月庚子条）责令留馆再学三年。经十六年再试，存与遂官翰林院编修。而此时正值高宗诏举经学，且首次南巡归来，濡染江南穷经考古、汉学复彰之风，因之高唱「经术昌明，无过今日」。（《清高宗实录》卷三八八，乾隆十六年五月丙午条）十七年，庄存与升侍讲，入直南书房，成为清高宗的文学侍从。

继圣祖、世宗之后，清高宗亦视《春秋》为帝王之学，命儒臣编纂《春秋直解》。乾隆二十三年八月，书成，高宗撰序刊行。序中有云：「中古之书，莫大于《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属辞比事，而原夫成书之始，即游、夏不能赞一辞。」该序指斥宋儒胡安国《春秋传》「傅会臆断」，宣称《直解》本清圣祖所定《春秋传说汇纂》为指南，「意在息诸说之纷歧以翼传，融诸传之同

异以尊经。』（《清高宗实录》卷五六九，乾隆二十三年八月丁卯条）

正是在令儒臣纂修《春秋直解》的前后，清高宗屡屡表彰汉儒董仲舒之学。乾隆十九年四月，高宗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阐发「天人合一」说，指出：「董仲舒以为，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又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清高宗实录》卷四六一，乾隆十九年四月乙巳条）三十七年四月，同样是策试天下贡士，高宗又称：「汉仲舒董氏，经术最醇。」（《清高宗实录》卷九〇七，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丙戌条）三十九年二月，高宗在经筵讲《论语》「克己复礼」，则以董仲舒与朱熹学说相比较，认为：「董仲舒正谊明道之论，略为近之。」（《清高宗实录》卷九五二，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己丑条）专制时代，「朕即国家」，帝王一己之好尚，对一时儒臣的为学，其影响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乾隆三十三年，庄存与为清高宗识拔，入直上书房，教授皇十一子永理。迄于五十一年告老还乡，存与任是职十馀年。他的《春秋正辞》，大概就始撰于入直上书房之后。我们之所以如此说，其根据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春秋正辞》秉高宗旨意，遵孟子之教，以《春秋》为天子之事。庄存与于此有云：「旧典礼经，左邱多闻。渊乎公羊，温故知新。谷梁绳愆，子夏所传。拾遗补阙，历世多贤。《春秋》应天，受命作制。孟子與有言，天子之事。以託王法，鲁无憾焉。以治万世，汉曷觊焉。」（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一《奉天辞第一》）书中，存与屡引董仲舒说，以明为君之道，力言维护「大一统」。所以道光初阮元辑《皇清经解》，著录《春秋正辞》，评存与是书云：「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谷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劭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也。」（阮元《庄

方耕宗伯经说序》，载庄存与《味经斋遗书》卷首。《覃经室集》不载。）

第二，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庄存与任会试副考官，翌年六月，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该科进士孔广森后撰《春秋公羊通义》，于书中大段征引庄存与说《春秋》语云：

座主庄侍郎为广森说此经曰，屈貉之役，左氏以为陈侯、郑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后至，麋子逃归。《春秋》一切不书主，书蔡侯者，甚恶蔡也。蔡同姓之长，而世役于楚，自觉诸夏……若蔡庄侯者，所谓用夷变夏者也。

广森服膺师说，认为：『三复斯言，诚《春秋》之微旨。』（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卷五《文公十年》）第三，《春秋正辞》凡九类，依次为奉天辞、天子辞、内辞、二霸辞、诸夏辞、外辞、禁暴辞、诛乱辞、传疑辞。大体类各一卷，惟内辞作上中下三卷，故全书凡十一卷，末附《春秋要指》、《春秋举例》各一卷。各类之下，再分子目，所列多寡不等，共计一百七十五目。今本所载，虽有目无书者甚多，因之光绪间所修《武阳志余》认为：『此书先生或未能毕业，故各类中多有目无书乎？』（庄毓鋮等《武阳志余》卷七《经籍·春秋正辞》）但就体例而言，则颇类讲章。关于这一点，可以魏源文为证。道光间，庄氏后人辑存与经说为《味经斋遗书》，魏源于卷首撰序云：

武进庄方耕少宗伯，乾隆中，以经术傅成亲王于上书房十有餘载，讲幄宣敷，茹吐道谊。子孙辑录成书，为《八卦观象上下篇》、《尚书既见》、《毛诗说》、《春秋正辞》、《周官记》如千卷。萃乎董胶西之对天人，醅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刘中垒之

陈古今，未尝凌杂爪析，如韩、董、班、徐数子所讥，故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魏

源集》上册《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

根据以上诸条，祖武认为，《春秋正辞》当撰于乾隆三十至四十年代间。庄存与著书，正值乾隆盛世，存与身在宫禁，周旋天子帝胄间，讲幄论学，岂敢去妄议社会危机！至于和珅之登上政治舞台，据《清高宗实录》和《清史稿》之和珅本传记，则在乾隆四十年，而其乱政肆虐，则已是乾隆四十五年以后。因此，庄存与之晚年，虽痛恨和珅之祸国，但若以此为其结撰《春秋正辞》之初衷，似可再做商量。

一孔之见，难得要领，谨以奉教逸明先生并读者诸高贤。

陈祖武谨识 庚辰孟秋于京东潘家园

作者自序

一九九六年，因编辑《清代经学图鉴》一书，查阅了许多清代学者年谱。在查阅过程中发现，有些年谱存世稀少，比如毛奇龄、万经、孔广林的年谱都是孤本。有些年谱虽尝见于著录，比如徐乾学和黄以周的年谱，但存世的可能性已很小了。另外，有些重要学者根本没有年谱。比如惠栋和庄存与就一直没有年谱。一九九七年初，我拜访陈祖武先生时曾请教道：「我们编《经学图鉴》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学者的生平资料很难找。像徐乾学、惠栋、庄存与、庄述祖这些重要学者都没有年谱。」陈先生高兴地说：「你们了解了不少情况。我一直鼓励年轻人为他们做年谱。这是硬碰硬的基础工作。庄存与、庄述祖的材料比较少见，我们所图书馆有一套民国印的《毗陵庄氏族谱》，你有空可以去看一看。」陈先生这几句话是我为清代学者编年谱的最初诱因。

一九九八年夏末，《清代经学图鉴》出版后不久，我如约到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看《毗陵庄氏族谱》。那是我编庄谱的开始。同年十月，我利用年假去了一趟南方，沿杭州、萧山、绍兴、宁波、上海、苏州、常州、扬州一线，专门考察清代经学家的故居，采访他们的后人。当时我还没决定写徐乾学和黄氏父子的年谱，所以没去昆山和定海。现在想起来还很后悔。在常州，我遇到了市文管会的贺忠贤先生。六十多岁的贺先生带我跑遍了目前在常州能找到的所有清代经学家的故居，包括庄存与故居。后来贺先生得知我正编庄谱，寄给我许多材料。最近还寄来谢忱先生新编的张惠言年谱。在贺先生的帮助下，转年春，庄谱就有了大概眉目。

正巧，一九九九年四月常州召开一个常州学派研讨会。贺先生将我的庄谱稿推荐给会议组织者，使我有幸与会。在会上，我见到了研究常州学派的著名专家汤志钧先生。汤先生说，他的母亲就是常州庄氏后裔，他也编了一个庄氏年谱，有二十多万字。轮到我发言时，我介绍了贺先生带我访问庄氏故居的经历。会议组织者当即决定，第二天集体参观庄氏故居。

庄存与是乾隆执政中期宫廷中一位不特别重要的文官，所任最大官职为礼部左侍郎，其生平史料集中记录在民国二十四年排印本《毗陵庄氏增修族谱》中。庄存与后来被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者逐渐重视起来，主要因为他被认为是清晚期流行的今文经学研究的最早发起者。晚清今文经学研究者中有不少人对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包括龚自珍、魏源和康有为等。因此厘清庄存与学术思想发生发展的理路就显得特别重要。但是很可惜，有关庄存与的史料中恰恰缺少反映其学术发展轨迹的记载。庄存与去世四十年后其遗著中的解经之作才刊刻行世，这些作品的确切写作时间已无从考证。庄存与的杂文集失传了。在当时其他学者的文集中没有见到庄存与写的序跋。他好像很少与人交往。较早评价庄氏学术的著名学者是龚自珍。庄存与去世三十年后，其孙庄绶甲到龚自珍家当家庭教师。庄绶甲对龚自珍讲述了爷爷的事迹，希望龚写一篇神道碑铭（好像一直没有人作为庄存与写墓志）。龚对庄的事迹留下了印象，但当时并没有答应写。来年龚自珍到京师，庄存与的外孙宋翔凤再次向龚讲述庄氏事迹，龚还没动笔。直到道光二年，距庄绶甲最初提出请求已过去了五年，龚自珍才为庄存与写了神道碑铭。神道碑铭相当于墓表，有别于纯属记实的墓志，一般应对墓主作出评价。但是龚自珍这篇一拖再拖的碑铭没有论定庄存与的学术归属。龚自珍是今文经学中人，他清楚庄氏学术的归属，但是因为庄绶甲和宋翔凤的关系，还因为当年提携龚自珍的刘逢禄是庄存与的外孙，所以龚自珍有

义务规避庄氏学术中不合潮流的一面。晚近评介庄氏学术的著述有杨向奎先生的《绎史斋学术文集·清代的今文经学》，汤志钧先生的《近代经学与政治》，以及美国艾尔曼先生的《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艾尔曼先生显然受到汤先生一些观点的影响，他也认为庄存与研究今文经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其目的是想通过学术研究影响当时的政治。

说实话，我目前还不能完全看懂庄存与的解经著作。我对庄存与学术理路的认知，是通过罗列其与学术有关的行迹推断出来的。庄存与生前在学术界没什么名望，虽然他的考试成绩很好，无论是会试还是进入宫廷后的例行考试，但是他那带有谏纬色彩的解经方法在当时不为学界所重。与他同时的享有较高声誉的学者是卢文弨（长庄二岁）、王鸣盛（小庄三岁）、戴震（小庄四岁）和纪昀（小庄五岁）这些人，他们都是汉学家。目前尚未发现庄存与同这些人交往的史料。我隐约觉得，庄存与同这些走红的汉学家们在学术观点上不小的矛盾。庄存与的家学属宋学系统，他之所以屡屡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后来又得到乾隆帝的赏识，都得益于此。因为当时所有考题及解题方法都出自宋儒经典，乾隆帝本人更是有名的宋学爱好者。乾隆因为重视朱熹学说，从而重视董仲舒《天人三策》。庄存与『以董子《春秋》受主知』，这个记载不能被视为乾隆帝和庄存与同时对今文经学发生兴趣的证据，它只能说明乾隆帝和庄存与都是宋学正统地位的维护者。他们都是因为宋儒重视董仲舒学说而重视董仲舒学说。还有两个事例可以作为判断庄存与学术归属的根据，一个是他坚持在官方颁布的教材中保留宋儒最喜欢的伪古文《尚书》的核心部分。一个是他自己明言，他撰写《春秋正辞》的直接原因只是为了重申赵汸对经典的理解。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庄存与不是一位自觉的今文经学研究者。如果一定要将其学术归入某一系统的话，它应该归入宋学系统。这是个有趣的结论，因为它打

破了推动社会变革的理论都源于显要学者发明的时髦学说这类形而上学的逻辑。即如被当时许多显要学者视为保守甚至迂腐的宋学，同样可以激发后人革新社会的灵感。

在一九九八年十月那次考察中，我还到了宁波，见到了宁波大学的方祖猷先生。当时方先生为我详细画出了万经故居和全祖望墓的位置，还送给我一部他与陈训慈先生合著的《万斯同年谱》。在方先生影响下，我对清代浙东学术有了一点了解。后来当方先生知道我编黄谱后马上写来信，热情地鼓励我，并告诉我许多查找史料的线索。编黄氏父子年谱开始于一九九八年底，其直接原因是首都图书馆的陈坚和马文大先生帮我检出了馆藏全套的《定海黄氏所著书》。《定海黄氏所著书》是入藏首图前由原藏书者自定的书名。《丛书综录》中没有这个书名。萧一山《清代学者生卒著述表》所录黄氏父子著作版本情况与这套书相符，估计萧先生就是根据现在首图的这套书著录的。但是萧先生没有提到这套书中的第二十六册，我叫它《做季集外文》。

黄式三是清末浙东民间塾师，通过刻苦自学，私下里撰写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解经著作。可惜他的考试成绩非常糟，仅以岁贡生终其一生。中年以后，黄式三陆续接触到一些在东南一带比较有名的学者，包括严可均、夏炘、吴德旋和方成珪。俞正燮曾对黄式三的一些文章给予了较高评价。黄式三的学术非常驳杂。他成长于缺乏学术气氛的穷乡僻壤，几乎看不到最新出版的学术著作，所以他的学术不属于任何现成的系统。后人评价黄式三，一般爱说他「汉宋兼采，实事求是」，因为他在表彰戴震哲学观点的同时，也维护朱熹学说的正统性。黄式三不仅擅长经学著述，他还写了许多关涉史学和诸子学的文章。特别是他那些探讨抽象概念的纯思辨文章，很难令人相信出自一位没有家学传统的乡村塾师之手。比如当英帝国侵略者攻陷定海，全

家颠簸于海陆间逃难的流民中时，黄式三居然在一篇杂记中从容地写道：「以前我曾把自家的书房叫做求是室，『由今思之，前之所谓求是者，是耶，非耶？今有自知其非者矣，有前之非而不尽知者，不能强也。然则今所谓是者，安知其实是？今之所谓非者，安知其真非？天假我一日，即读一日之书，而求其是。求之，云尔。其是与非，俟后人定之，己不能定也。』」

黄式三季子黄以周的考试成绩依然不理想，只通过了举人考试。但黄以周在学术界获得了较大声誉。他在三十七岁参加科举考试时引起主考学政的注意。学政问他解释经义的根据，他将两年前去世的父亲的遗著交给学政。学政阅读这些遗著后非常惊讶，决定批准黄式三从祀府、厅乡贤祠和诂经精舍先觉祠。后来黄以周在工作上取得了两大成就，一个是在浙江书局工作期间，主持了许多重要书籍，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辑佚、校勘工作。一个是在南菁书院主持教学工作期间，培养出了包括陈庆年、曹元弼、唐文治、吴稚晖和丁福保在内的一大批学、政界风云人物。黄以周自己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以《礼书通故》一书产生的影响最大，俞樾为它写了热情洋溢的序。黄以周去世前，西方化的浪潮已愈演愈烈，不可遏制，但黄以周还是试图阻止他的学生学习西学。甚至在他去世前写给学生的一封信中，还流露出了对理工科的蔑视。

黄式三的生平事迹集中记录在黄以周所作《先考言行略》中。黄式三参与编撰的黄氏族谱现在可能仍保存在浙东民间，其中一定记载着黄家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比如黄式三的几位叔叔以及他的第二位妻子的情況。黄以周的生平事迹散见于几位学者所作的粗略传记中。比较常见的有缪荃孙著《黄先生墓志铭》和章炳麟著《黄先生传》。《清儒学术讨论第一集》（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版）收录的黄以周的亲近弟子唐文治

所著《黄元同先生学案》，是一篇很少被提到的记述黄氏学术的文献。这份文献记载，黄的另一位亲近弟子王兆芳曾撰有一篇详细的黄先生行述。王兆芳年纪很轻就去世了。目前还不知道这篇行述是否刊刻在什么书中，其手稿是否还保留在世。另外，《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著录近代宁海干人俊先生曾编有《黄傲季年谱》稿本两卷，一直没有刊印，同样不知它是否还保留在世。晚近学者撰写的有关黄以周生平学术的最有价值文献，是洪焕椿先生所著《浙江文献丛考》中的《定海黄以周的经学著作》一文。它告诉我们，现在宁波一带民间还藏有大量的黄以周手稿。

决定编徐乾学年谱也是在一九九八年底。有一天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翁连溪先生请韦尔立和我在军机处吃饭，我抱怨说，北京只有中科院图书馆藏有《檐园文集》，但调阅不便。翁先生马上说，你别去了，我帮你解决。没几天，他就帮我复印了全套的《檐园文集》，是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复印的。直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从他手里接过《檐园文集》时的心情。

徐乾学是康熙执政前期江南知识分子在宫廷中的领袖，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曾受命总裁《明史》《大清一统志》等官修书籍，又帮康熙帝编辑了类书《御选古文渊鉴》和《鉴古辑览》。徐乾学私下主持辑刻的大型丛书《通志堂经解》和他与万斯同合编的《读礼通考》，是有清一代钩沉辑佚、汇编经解的先声。徐乾学还是清初最著名的学术活动赞助人，许多学者的学术成果都是在他帮助下取得的。比如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胡渭的《禹贡锥指》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另一方面，徐乾学又是清初对异族统治阿谀逢迎、趋炎附势的典型。特别是其显贵后贪污腐败，放纵亲信子侄，勾结地方官吏鱼肉乡里，导致其去世后声誉迅速衰减。过去人们对徐氏生平事迹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他的学生韩荃所作行述。《昆山新阳县合

志》记载徐乾学的曾孙徐传珍曾与族子徐凌云纂辑徐家族谱，现在美国尤他州家谱学会收藏的《徐乾学家谱》可能与此有关。《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著录近代昆山徐昆编有《徐健康先生年谱》稿本一种。但是没见到有文章引用过这部稿本。晚近学者为徐乾学撰写的传记，只见到刘建新先生为《清代人物传稿》撰写的《徐乾学》一文。它引用史料的广泛程度和对徐氏生平记述的详细程度，超过了一九四三年美国洛克菲勒公司资助编撰的《清代名人传略》中的《徐乾学》条。

徐乾学一生受两个人影响特别大。前半生受其舅父顾炎武影响，后半生受康熙帝倚重的明珠影响。康熙初年，徐乾学同许多江浙一带的知识青年一样，受到科场案和奏销案的打击，走投无路。他曾到广州一带游历，并两次到达汕头。那里有通往福建前线的航线。南明残留军队当时正在福建沿海与清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很快，清军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徐乾学得到消息后立即北返，连续参加新朝的考试，并在康熙九年获得了服务新朝的机会。始终怀有反清情绪的顾炎武疏远了这个渴望出人头地的外甥（顾徐矛盾也许还因为徐乾学与顾炎武的仇人叶方恒家结亲），顾后来还曾当众指责徐。但徐乾学却一如既往地敬重舅父，并一直在暗地里保护着舅父的安全。贪婪的明珠是徐乾学在朝廷中的靠山，徐乾学帮助明珠收受过许多贿赂。如果不是皇帝秘密指使，徐乾学绝对不敢参劾明珠。但是明珠不可能恨康熙帝，他只恨徐乾学，并且一定要置之死地。假如明珠的外甥傅腊塔晚死两年，说不定会亲手杀了徐乾学。

读书、编书占去徐乾学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徐家祖上没给徐乾学留下什么藏书，他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成了闻名江南的大藏书家，是值得怀疑的。此外《通志堂经解》的编刊过程也扑朔迷离。我注意到了这些一般传记中语焉不详的关键之处，但尚未一一考证翔实。我曾给美国尤他州家谱学会发过电子邮件，询问